

李白詩集

5.6
10

李白考异录

李从军 著

齐鲁书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李白考异录

李从军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2插页 141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10206·154 定价 1.20 元

前 言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作，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艺术瑰宝。它们浑浩流转，气象万千：有的宛如天山云海中的明月，意境深远；有的就象直射东海的黄河，激情澎湃；有的好似危峰突起的华岳，奇峭峻拔；有的胜过清水初出的芙蓉，清丽无比。这些作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的挚爱和向往、愤怒和哀伤，鲜明真率，盛传不衰。

然而，在李白的诗作中，也有浓雾掩盖下的暗窟和潜流，构成了一座座迷宫，一千多年来，令人相对茫然。诗人的行踪，有时出现在庙廊、酒肆、山径、黄沙、白雪和荆棘草莽之中，有时依稀可辨，有时无迹可寻。诗人的家世和身世，现有记载也只是一些残篇和隐语，使得人们虽苦苦冥思，也无法揭出谜底。因此，继续研究李白，还其生平与作品以本来面目，仍为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当然，在李白的研究中，前人成绩卓著，只是需要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有所发现。

拙稿收文十余篇，其中多篇已经发表，重在对李白的家世、生平进行考索。其中有些地方，牵涉到李白生平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对某些传统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这里面包括李

白的出生地、家世、家室、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归蜀、三入长安及李白卒年等问题。当然,这些考索和结论是否确当,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商榷。

考证李白生平的目的是要借助考证的结果,去正确地理解、分析李白的诗歌内涵,了解李白思想及其诗风的演变过程,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潜在作用。这正是拙稿所力求去达到的。如就李白的《蜀道难》一诗而言,千年以来人们认为李白一生从未到过剑阁、《蜀道难》一诗纯属诗人臆想之词。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误说。笔者在拙稿的一节中,认为此诗是李白开元年间初入长安后归蜀时所写,是诗人在谋仕失败的特定感情状态下的作品。而李白开元年间奋发向上的边塞诗歌,也大多数是他陇右边塞行时的作品。此外,由《别储邕之剡中》等诗还可以得知,远在写《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之前的开元年间,李白就曾到过天姥,对天姥山有着一定的感性认识。而诗人关于南岳衡山的诗歌,也并不是凭空乱想所产生的。诗人在南岳的行踪,不难考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表明对于李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谓李白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仅仅由天生一枝神笔、凭空驰情所致的,而是诗人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的感性认识与天才想象的结合物。对于这一点,人们却认识不足,往往只去强调诗人飘逸虚幻的外在,而忽视了诗人现实生活的内涵。

在拙稿中,笔者还考证了李白曾三入长安的问题。李白的三次入长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李白诗歌的分期问题,

从而去了解李白思想和诗风的演变过程。

李白的三次入长安，每次之间都大约相距十年，而每一次入长安都使李白的思想演变产生一个飞跃。从而使每一个间隔期都呈现了与前一个时期所不同的一个新的、带有特定时期社会特点的思想演进阶段。这样，这三次入京，就很自然地、严整地把李白的思想、以至于诗歌创作，划分成时间上相等、然而内容上却各不相同的四个十年分期。而每次居长安的期间，又是上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当然，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个过渡期间的作用，如果没有每个阶段中量的积蓄、局部的改变，仅凭过渡期间，是不能产生飞跃的。然而，它又确实是使飞跃最终产生的那一击。三次入长安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四个阶段，具体地说来就是：开元二十年左右初入长安前的十年，我们姑且把它称为青年时期；开元二十年初入长安后的十年，我们把它称为青壮年时期；天宝初再入长安后的十年，我们把它称为中年时期；天宝后期三入长安后的十年，我们把它称为晚年时期。这四个时期中的每个时期，都不是孤立存在着的，每两个时期之间，都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而又好象有着一条闪光的红线贯串于诗人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之中。但是，即便如此，它们却又很明显地表现了各自之间的区别。

李白开元二十年初入长安前的十年间，也就是大约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年时期，作品中多为山水放逸之作，虽不乏抱负，但对社会和人生，很难说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作品的风格是较清新的，多为五言，篇制不长。初入长安后的十年间，

也就是大约三十岁到四十岁的青壮年时期，在要求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受到了较大的挫折，再加之对世态炎凉的体会，对社会和人生有了一定的认识，早年的放逸之气中夹杂着愤懑之情，诗风也随之有了一定的改变。不过作品中仍然带有开元时代所具有的向上精神。作品中的乐府诗歌增多，而且出现了长篇。特别是初出长安不久的一段时间，表现得格外明显。《行路难》、《蜀道难》等即写于此时。天宝初再入长安后的十年间，也就是大约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中年时期，李白在政治上再次受到挫折，也目睹了朝廷趋于腐败的政治，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加深了。早年的逸气有很大的变化，诗中带有深沉、郁闷，甚至是某种虚幻的情调。歌行体较多。这个时期作品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诗人对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对人生的艰难也体会得更深。但是，两年的宫廷侍从生活毕竟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烙印。在他对黑暗政治的暴露中，带着对盛世不返的轻微嗟叹。他对统治阶级表示决绝的同时，又有着对皇恩和侍从生活的深深眷恋之情。天宝十一、二载三入长安后的十年间，也就是五十岁到六十岁的晚年时期，随着时代和政治的动荡，诗人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天宝后期的腐败政治和各种危机，使李白在三入长安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屈原式的忧患愤懑中，对现实的批判更加尖锐、大胆，甚至指斥到最高统治者的头上。而一旦对现实失望之后，作品中虚幻遁世的色彩更加浓厚。从璘以后，入狱、流放，使诗人的作品有些悲凉之气。晚年末期的诗歌多

五言，少歌行，篇制较长，趋于平淡，有返回前期而又有些不同于前期的迹象。这就是四个时期演变的概况。其中李白的第三次入长安，对于李白的思想演变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使它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需要指出的是，在李白的生平和作品中，不但还有许多需要人们进一步弄清的问题，而且有某些地方，在研究中几乎还是空白。如未出川之前和迁居东鲁后的开元后期行踪等等。也还有些问题，至今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如他多次客居金陵，在金陵一带所写的诗歌，有一百余篇，在李白的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为什么李白对金陵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些诗歌又当如何系年等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

笔者囿于学识浅陋，论述中一定有许多疏漏、不实和错误之处，尚望专家和读者们赐教。

拙稿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郭石山师的多方指导，由赵西陆、喻朝刚、王士博诸师那里也多受裨益。此外，还得到张松如（公木）师的指正和力荐，萧涤非师最后审阅、修定了全稿，并亲为题签，于此一并深表谢意。

一九八四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1
李白出生地考异	1
碎叶、条支与李白出生地	13
李白出生地与四家之说是非辨	21
李白家世考索	40
李白家室考辨	51
李白第一次入长安考异	68
李白归蜀考	79
李白陇右边塞行考索	93
李白“躬耕”考	104
李白三入长安考	112
由江东之游再考李白的三入长安	130
关于李白三入长安质疑的质疑	147
《梁甫吟》辨	160
李白与宗氏婚配考	177
李白诗中崔侍御辨误	191
李白“请缨”考	203
李白卒年辨	210

李白出生地考异

李白的出生地问题，自近代以来，颇为研究者们所注意，且所见各异，其中以陈寅恪先生的李白“为西域胡人”说特异（《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见《清华学报》第十卷一期）。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用大量的史料论证了李白为“胡人之说”为非。从而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不过郭老在书中断李白出生地为中亚碎叶一说，笔者认为与史料不符。经过考证，笔者认为李白的出生地，不在中亚碎叶，而是在焉耆碎叶。

按唐代有两个碎叶，一为中亚碎叶，又一为焉耆碎叶。中亚碎叶，即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境内伊塞克湖畔的托克马克一带；焉耆碎叶即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博斯腾湖畔的库尔勒与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焉耆碎叶是焉耆都督府辖地，中亚碎叶，是濛池都护府辖地，有史可证。《新唐书·地理志》载：“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置（644），有碎叶城”。《唐书·突厥传》载：“显庆二年（657）……苏定方攻贺鲁于碎叶水，大破之”。碎叶水即《大唐西域记》中的素叶水，由中亚碎叶城北东入伊塞克湖。《旧唐书·高宗本纪》又载：显庆“二年（657）春，正月庚寅幸洛阳。命右屯

卫将军苏定方等四将军为伊丽道将军，帅师以讨贺鲁。……三年春……甲寅，西域平，以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由此可知，显庆三年（658）中亚碎叶即为唐辖地。又，《旧唐书·王方翼传》载：“永隆中（681），车簿反叛，……方翼屯兵热海，与贼速战……大溃，擒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热海即伊塞克湖。由上述史料可知，中亚碎叶与焉耆碎叶均曾在唐朝版图之内无疑。

现今为苏联吉尔吉斯境内托克马克一带的中亚碎叶，虽曾为唐朝的辖地，但是，它并不是李白的出生地。郭沫若引了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的“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和李阳冰《草堂集序》中的“中叶非罪，谪居条支”两段文字，定范碑所云“碎叶”为中亚碎叶城；断李序所云“条支”为条支都督府，并说中亚碎叶城隶属于条支都督府（见《李白与杜甫》3—5页），笔者认为以上论断有误，今论述于下。

一、焉耆碎叶作为李白生地的可能是不被排除的

郭沫若先生论定中亚碎叶城为李白出生地时说：

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

……

考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又其一为

焉耆碎叶。焉耆碎叶，其城为王方翼所筑，筑于高宗调露元年（679）。《碑文》（指范传正《唐……李公新墓碑》）既标明“隋末”，可见李白的生地是中亚碎叶，而非焉耆碎叶。

这样，一下就把焉耆碎叶作为李白出生地的可能性排除了。这里仅据王方翼筑城一事，就断定高宗调露元年前无焉耆碎叶，失考。

实际上，焉耆碎叶早已有之。《新唐书·地理志》载：“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又据《新唐书·西域传》载：“石（国）……西南五百里康也，圆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素叶河即中亚碎叶河。方圆千里的石国与中亚碎叶接境，东米国西南至石国仅一千五百里，而东至碎叶国有五千里之遥，可知此碎叶国非中亚碎叶，其地望正在焉耆一带。为了有别于中亚碎叶，我们称其为焉耆碎叶。

《新唐书·地理志》说明以上记载得之于唐贞元时宰相贾耽所考：“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若将臣之所征讨，敕使之所慰赐，宜有以记其所从出。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贾耽大历年间曾为鸿胪卿，谙熟“四夷”地要。为相期间，上《吴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据前文引述，把后来归属为唐羁縻州的

诸地，称为“碎叶国”“石国”“拔汗那国”，可见在未置都督府、州之前，就已有碎叶等国的存在了。而郭孝恪破焉耆在贞观十八年（644），置焉耆都督府。因此，远在王方翼筑城前，焉耆碎叶，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谓碎叶国，早已有之。

不仅焉耆碎叶早已有之，其实，就是焉耆碎叶城，最初也并不是王方翼所筑。

郭沫若认为高宗调露前无焉耆碎叶城，来自对《新唐书·地理志》错误句读：

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

笔者认为，调露元年（679）之前，焉耆碎叶并非没有碎叶城。《新唐书》云王方翼筑城，乃指修筑碎叶城墙城门。下面不妨引一下今本《通鉴》所述，观其断句及对王方翼筑城的解释：

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胡注：“碎叶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

意思很明确，焉耆碎叶城，为焉耆都督府治所，并非由王方翼筑城而得。下面，我们不妨用有关王方翼筑城的史料，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

仪凤四年（679），左骁卫大将军兼匭延都督阿史那都支叛乱，自号十姓可汗，与吐蕃连合，侵逼安西。吏部侍郎

裴行俭借册送波斯王子为名，计擒都支。

……都支先与李遮旬约，秋中拒汉使，猝闻军至，计无所出，帅其子弟迎谒，遂擒之。因传其契箭，悉召诸部酋长。执送碎叶城。……遮旬亦降。于是囚都支，遮旬以归，遣波斯王自还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

（《通鉴·唐纪十八》）

史料表明：王方翼筑城在平乱后，而擒都支时，就“执送碎叶城”了，这说明王方翼筑城前，碎叶城早已存在。再者，阿史那都支为匭延都督，府治在今克拉玛依市北。《旧唐书·裴行俭传》载都支“扇动部落，侵逼安西，连和吐蕃”，彼时安西都护府在龟兹（今库车），既是“侵逼”，且与吐蕃连和，都支当是南下，被擒地点，正是在焉耆碎叶附近。这又由张说的《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可证：

仪凤二年，十姓主可汗匭延都支为李遮旬潜构，犬戎倣扰西域。……公乃解严以友谍，托猎于训旅，误之多方，间其无备，裹粮十日，执都支于帐前，……立碑碎叶。

裴行俭是由西州出发的，且途中皆沙碛，既是“裹粮十日执都支”“执送碎叶城”，可见此碎叶城不可能是远在距西州两千里的中亚碎叶，而只能是距西州数百里的焉耆碎叶。因此，这更加说明焉耆碎叶城在平乱之前就已存在。裴行俭之所以“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是因为焉耆碎叶城正当西要冲之地，须加强防守设施，以备不测。“筑四面十

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这样更利于镇守罢了。

焉耆碎叶既然在王方翼筑城前早已有之，那么，它作为李白出生地的可能性就不能被排除。

二、条支地望并非在中亚碎叶一带

现在，再看郭沫若先生对“条支”的论定：

唐代有条支都督府，于诃达罗支国所治伏宝瑟颠城置，以其王领之，仍于其部分置八州。（《唐书·地理志三》）这个都督府乃‘西域十六都督府之一，皆属安西都护统摄’，旧不详其地望所在。……条支都督府所辖地即今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是毫无疑问的。

（《李白与杜甫》4—5页）

以上所论，也同样失考。苏联境内的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一带、即中亚碎叶一带，由前面所引史料得知，为唐所属。但是，它在濛池都护府治下，与“西域十六都督府”之一的条支都督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条支都督府，也并非“旧不详其地望所在”，检阅史料，我们可以明确指出。《新唐书·地理志》载：“条支都督府（以诃达罗支国伏宝瑟颠城置）。”那末，诃达罗支国的地望何在呢？

谢颺居吐火罗西南，本曰嘈矩吒，或曰漕矩，显庆时谓诃达罗支，武后改今号。东距罽宾，东北帆延，

皆四百里。

（《新唐书·西域传》）

条支都督府置于高宗龙朔元年（661），谢颺称诃达罗支在高宗显庆时（656—661），二者完全相合。诃达罗支国的地望在吐火罗西南，即今阿富汗的喀布尔一带。约距中亚碎叶两千余里，中隔数国，与中亚碎叶毫无关联。史书记载是明白如火的，只不过郭沫若把此处给疏忽了。由上可知，条支都督府与中亚碎叶城是无法牵扯到一处的。这个“条支都督府”不是一个专有的地名，它设在谢颺国，又称漕矩国、诃达罗支国的伏宝瑟颠城，其所在地并无“条支”的称谓，只不过借代称西方极远之地的“条支”来名其都督府而已，而且它是高宗龙朔元年（661）时才设立的，只是一个临时的军政机构，安史之乱后实际上就不存在了。

郭沫若又举了李白的《战城南》来说明条支与中亚碎叶城的关系：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
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郭沫若指出：“葱河为喀什噶尔河，发源于葱岭东麓，天山也发脉于葱岭，东北走而随地异名。诗中的‘条支’与葱河、天山等连文，表示其地望相接，必指唐代条支都督府的条支，而非远在阿拉伯的大食国。此唐代条支，既与葱河、天山等接壤，自当包含碎叶。是则所谓‘条支海’……如非伊塞克湖，当即巴尔喀什湖”。（《李白与杜甫》4—5页）

郭沫若把李白诗中的条支与李阳冰序文中的条支联系到一起，对李白生地进行考察，确为卓识。他推理的大前提是对的：“诗中的‘条支’，与葱河，天山等连文，表示其地望相接……此唐代条支，既与葱河、天山等接壤，自当包含碎叶”。可是所得的结论，即条支海如非伊塞克湖（热海），当即巴尔喀什湖、条支地望即中亚碎叶一带，这却是错误的。其原因正在于他推理的小前提错了。也就是说把李白《战城南》诗中所说的“葱河”、“天山”的概念弄错了。

郭沫若以为葱河为喀什噶尔河，大误。喀什噶尔河源出葛罗岭，与葱河不能比傅。王琦引《汉书·西域传》注葱河曰：

“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流蒲昌海”。此河正是因源出葱岭而得名，即今新疆境内的塔里木河。李白诗中的天山，也并非横贯在新疆境内今天所说的天山。汉代、唐代所谓的天山，乃折罗曼山，在今哈密北。出处见《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年）贰师将军……与左贤王战于天山”。晋灼曰：“在西域，近蒲类国”。（案：今哈密一带）《旧唐书·地理志》载：“置西伊州始于此。天山，在州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白山，胡人呼为折罗曼山”。又，《元和郡县志》载：“天山，一名白山，一名时罗曼山，在（伊）州北一百二十里，春夏有雪，出好木及金铁，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拜。”（卷四）。折罗曼山与中亚碎叶相距两千余里，塔里木河由葱岭东入蒲昌海，根本谈不上与中亚碎叶“地望相接”。因此，李白诗中的条支海，绝非伊塞克湖与